

專輯論文

新聞教育如何塑造不一樣的未來記者： 中國大陸與香港新聞學生對記者角色認知的 比較研究(2008-2014)

鄧力

摘要

不同的社會、政治及文化環境中，不同的新聞教育體制會對新聞學生在職業方面的認知產生何種不同影響，從而塑造出不一樣的未來記者？本文對中國大陸與香港地區這兩個正在經歷轉型的社會環境之下的新聞學生的記者角色認知進行比較研究。本研究使用2008年與2014年兩次問卷調查的數據，來對比呈現兩地新聞學生對記者角色的認知及對新聞教育的評估之間差異及其變化。時隔六年，除「應和者」角色之外，兩地學生對其他五種記者角色即「資訊散佈」、「解釋政府政策」、「鼓吹民意」、「文化娛樂」、「對立」的看法更趨於一致，而兩地學生對開設課程的變化也有相似的評估。在不同類型的預測變量中，教

鄧力，中國政法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研究興趣：政治傳播、抗爭政治與傳媒、媒介化政治、記者的社會化。電郵：lyndengli@gmail.com
論文投稿日期：2015年3月12日。論文接受日期：2015年9月8日。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36期(2016)

育變量如對新聞教育目標的認知與對各類課程比重的認知等變量，個人變量如愛國觀念與各類政治新聞接觸等變量，對兩地學生的記者角色認知具有一定的預測能力。其中，兩地學生對「應和者」角色、對新聞教育是「為國家」培養人才與「愛國觀念」的認知，這三個變量在六年間的變化出現了較為一致的模式並存在相關關係。

關鍵詞：新聞學生、記者角色認知、新聞教育、比較研究

Special Issue Article

Journalism Education and Perceived Journalistic Roles of J-school Student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2008–2014)

Li DENG

Abstract

As institutions of formal education, journalism schools (J-school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haping students' professional ideas in addition to other factors such as the local journalistic culture. This study compares two sets of survey data that were collected from J-school students i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in 2008 and 2014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how journalists-to-be from different socio-political contexts perceive the role of their future profession. The comparison showed tha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erceptions of students i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regarding journalistic roles and the courses offered in J-schools have narrowed during the past six years. By measuring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the role of journalists in a society, this study adds the role of consonance to those of interpreter, adversarial, populist mobilizer, disseminator, and provider of culture and entertainment. While both groups of students regarded the latter five journalistic roles a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role of consonance, in 2014, the Hong Kong students rated the role of consonanc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mainland China students did. Furthermore, students' personal media usage patterns and individual attitudes affected their perceptions of journalistic roles. The findings showed that in both

Li DENG (Lecturer).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Research interest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contentious politics and media, mediated politics, socialization of journalists.

groups of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the journalistic role of consonance, the degree of patriotism, and the nationalist aims of journalism all declined from 2008 to 2014.

Keywords: J-school students, perception of journalistic roles, journalism education, comparative study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Deng, L. (2016). Journalism education and perceived journalistic roles of J-school student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2008–2014). *Communication & Society*, 36, 69–103.

鳴謝

本文為作者接受中國政法大學校級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資助的成果之一。作者感謝諸多師友在問卷收集過程中的無私幫助，感謝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數位時代的傳播教育：問題與挑戰」工作坊提供的交流機會，也感謝本刊匿名評審與編委會給予的詳盡修改意見。

研究背景

在不同的社會、政治及文化環境下，不同的新聞教育體制，會對新聞專業學生在職業方面的認知產生何種不同影響，從而塑造出不一樣的未來記者？記者角色認知是新聞從業者調查的一項核心內容，本文對中港兩地的新聞學生進行記者角色認知的比較研究，以此反映不同社會的新聞教育之異同，並勾勒出未來新聞從業者的不同成長圖景。

作為比較研究，本研究選取的比較對象是中國大陸與香港地區這兩個正在經歷轉型的社會環境之下的新聞學生對本行業的認知。媒體轉型是社會轉型的重要社會文化指標之一，急速的轉型也為新聞從業者和新聞學生的媒介角色認同帶來某種程度的不一致性與混雜性。這六年來，中港社會都在經歷轉型，而新聞行業的景象隨著時代變遷也發生變化：傳媒產業的發展與擴張是中國大陸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重要指標之一，經歷了新聞改革之後的新聞實踐中，仍同時存在著宣傳工作與學習西方專業主義的新聞操作手法；而香港社會在近年來則浸淫於一種愈發濃烈的本土意識加強、社會運動頻發的政治文化當中，同時本土新聞媒體人開始感受到自身專業準則受到審查與自我審查挑戰的危機感。變遷中的社會環境指標，以及不同的新聞教育模式，會為兩地新聞專業學生的職業角色認知帶來哪些不同？

對於新聞學生的社會化而言，時代與社會提供給學生耳濡目染的大背景，但教育體制與新聞課堂內容無疑是最直接而系統的影響，合力塑造著新聞學子對自我及未來職業的認知。本研究分以下三個層次來呈現兩地新聞學生認知差異及成因：首先是描摹現狀——新聞學院課程安排比例有哪些不同、學生選擇新聞專業的動機和對未來定位有何差異；其次是測量想像——新聞學生對自我或未來自我的職業認知有何不同；最後是探究成因——社會或教育層面的哪些變量造成了學生記者角色認知的差異。

以上三個層面是橫向來剖析兩地新聞學子的認知差異，本研究還將從時間的縱向維度來看2008年與2014年這些指標的變化，即考察這六年間的社會轉型與新聞業變遷如何作用于新聞學生的認知。

綜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兩個問題：

第一，兩地的社會環境指標、理念與內容皆不相同的新聞教育，會讓兩地新聞專業學生對記者角色的認知呈現哪些差異？這些差異在六年間有何變化？

第二，哪些變量造成這些差異，呈現何種影響模式？而這種影響模式在2008年與2014年又會有何不同？

文獻綜述

新聞系學生的記者角色認知

在多年來的記者調查研究中，一項重要的測量即是問新聞從業者認為不同媒介角色 (media roles) 有多重要。記者對新聞媒體在社會中應當扮演的角色的看法，會影響其選擇何種新聞實踐手法，而這種看法或認知的形成，並非始於入行之後，而是在一開始就受到了他們所受教育的影響 (Fröhlich & Holtz-Bacha, 2003)。本文測量在校的新聞學生對記者或媒介角色的認知，實質上就是在測量他們對未來自我或未來職業的認知，換一種說法，即是能夠看出他們在被新聞機構進一步社會化之前，所接受、認同及傾向於選擇的記者角色與新聞操作手法。

經過學者對記者群體的歷次問卷調查研究，幾項不同的記者角色固定了下來：資訊散佈 (disseminator)、解釋與調查 (interpretive)、對立 (批評與監督) (adversarial)，後來又發展了第四種「鼓吹民意」角色 (populist mobilizer) (Weaver, Bean, Brownlee, Voakes, & Wilhoit, 2006; Weaver & Wilhoit, 1986, 1996; Weaver & Wu, 1998)。這樣的分類並非憑空想像而來，問卷問題的演變與當年美國新聞業界與學界所關切的議題變化相關。以客觀性理念在美國新聞業中的誕生、發展，及受到質疑 (Schudson, 1978, 1995, 2003; Zhao & Hackett, 1998) 為線索，可以看到業界從上世紀60年代就開始討論記者的社會職能：記者是應該遵循中立平衡的原則，做信息的散佈者，還是應該對複雜新聞作出解釋分析？而在上世紀70年代初，新聞業出現「水門事件」這一在調查性報道中有著「神話」(myth) 地位的著名報道 (Schudson, 1995)，媒體調查和質疑公權力的對立角色也愈加受到重視。伴隨著對記者多元社會職能

的討論，一系列考察記者應當充當何種社會角色的實證研究，便於上世紀70年代興起，並逐步完善形成涵蓋了上述四種記者角色的問卷調查題項(羅文輝、陳韜文等，2004：163–166)，其初衷其實是回應美國新聞史上歷時多年的爭論。實證研究也證明，新聞從業者所最為認同的幾個記者角色並無法完全切割開，往往是相互重疊的(Weaver et al., 2006, p. 146)。

雖源於美國新聞業，這套問卷很快被用在了測量不同國家的記者群體，也被用在了比較研究當中(如 Wu, Weaver, & Johnson, 1996; Zhu, Weaver, Lo, Chen, & Wu, 1997)。而與本文的比較研究對象最為接近的研究，即是幾位華人學者對中港臺三地記者的比較研究(陳韜文、羅文輝、潘忠黨，2003；羅文輝、陳韜文等，2004；羅文輝、陳韜文、潘忠黨，2001；Lo, Chan, & Pan, 2005)。幾位華人學者延續了在全球範圍內發展已久的記者研究傳統，根據本地情況採納並修正了前人發展的量表，來比較大陸、香港和臺灣新聞人員對記者角色的認知，他們使用了18道題項，通過主成份方差分析，得出五種記者角色認知的類型，即「資訊散佈」、「解釋政府政策」、「鼓吹民意」、「文化與娛樂」、「對立」。由於相似的社會環境，本文將以此問卷題項為基礎，測量中港兩地新聞學生對記者角色的認知(羅文輝、陳韜文等，2004)。

除了以上五種角色認知，本文作者曾在2008年對大陸與香港新聞學生的調查問卷中，加入了第六種「應和者」(consonance)的記者角色認知，以考察學生認為記者在其職業實踐中應該在多大程度上與官方政治機構保持一致(Deng & Ma, 2009)。與以上五種記者角色對應著美國新聞業的發展及相關討論一樣，「應和者」這一記者角色的提出，也源自對中港兩地新聞實踐現象及相關話語的觀察。大陸新聞業並不由新聞專業主義所主導，還存在著「黨的新聞事業」這一新聞觀念，而後者所對應的記者角色，便更多強調新聞工作者應有「大局觀」，但這一點並不完全等同於西方新聞業的「社會責任論」，而是強調記者的報道要作國家及社會層面整體性的考慮。同時，隨著近年來的政治格局變化，香港新聞業也出現了記者是否應該減少報道負面新聞，避免導致社會分裂的討論。因此，加入「應和者」這一記者角色的測量，是想來看當所考察社會的新聞實踐中存在這種實際現象時，個體認知的情況

又如何。在測量時，該部分參考了兩位香港學者 (So & Chan, 2007) 分別於 1996 年、2001 年和 2006 年對香港記者進行的問卷調查中測量他們對「媒介社會角色及影響」之認知的題項，由此組成了本研究問卷中由 6 個題項組成的「應和者」記者角色認知的量表。在分析 2008 年對中港學生的問卷調查數據 (Deng & Ma, 2009) 時，方差分析的結果確定了這一項角色認知可以區分於前五種角色認知，可用於下一步的回歸分析。

本研究第一組研究問題即是：在兩地新聞學生的腦海中，新聞媒介應扮演甚麼樣的角色？新聞媒介在報道新聞時，應該根據事實迅速報道，還是應該解釋分析政府政策，亦或充當質疑角色？媒體應當引導民意推動改革，還是應顧全大局而減少批評，或以提升百姓文化水準與娛樂為己任？針對上述六種記者角色，本研究首先將比較大陸、香港新聞專業學生對它們的認知有何異同，以及 6 年來這些認知有何變化。

預測變量：記者角色認知差異與新聞教育變量

除了考察這六年來兩地新聞學生對記者角色的認知有何差異之外，本研究還會考察哪些因素影響了新聞學生對記者角色的認知。從上世紀七十年代起，社會學對新聞從業者這一職業的考察諸多，關於新聞生產的諸多研究也總結出多種因素在影響、塑造這一職業及其中個體的認知，比如宏觀層面的特定政治經濟結構之中所屬新聞機構對記者的社會化，微觀層面上記者個人的教育經歷等等，都會影響記者對在社會中應扮演何種角色的認知差異 (Gans, 1980; Schudson, 2003; Shoemaker & Reese, 1996)。而對記者角色認知的考察，實際關照的是新聞從業者使用哪些觀念與價值來確立自身行業的合法性與獨立性 (Waisbord, 2013)。相關研究從不同角度來看這些記者角色在日常新聞實踐中如何被履行，比如以上提及的對新聞生產過程與新聞常規的社會學考察，還有對最終新聞產品的內容分析 (Mellado, 2015)。而本文所參考的文獻，則是從量化的途徑，將不同的記者角色認知看作是新聞從業者不同觀念與價值的綜合分類，將這些因素總結成為可測量的變量，再量化地去考察影響這些認知的理論上的「成因」(theoretical

“causes”)——即不同類型的自變量——在預測記者角色認知時具有何種預測力。

除了記者角色認知之外，新聞從業者調查通常還會測量新聞人員的基本背景、教育與訓練、工作狀態與工作滿足，以及價值與倫理問題，在後續的數據分析中，用來分析可能影響記者角色認知的自變量有各種類型，包括個人變量(教育程度、是否新聞專業畢業等)、組織變量(規模、媒介形態等)、對新聞專業主義的看法，以及不同的外部原因(廣告商、受眾、消息源)等(Weaver et al., 2006, pp. 146–150)。而針對中港臺三地的記者調查(羅文輝、陳韜文等，2004)與針對中國大陸、臺灣和美國記者的調查(Zhu et al., 1997)都顯示，在解釋各地記者認知差異的不同變量之中，社會變量的解釋力高於其它層面如機構、個人層面的變量。

本文在考察中港新聞系學生認知時，預測變量首先包括社會變量(中港對比)，而其它變量當中，針對正式記者的組織和行業變量便不再納入考量。本研究在考慮哪些自變量對新聞學生的記者角色認知有預測力時，更多從新聞學生群體的特點出發，首先將其所受直接影響的新聞教育作為首要的自變量。由此，本研究考察兩岸不同的新聞教育機制對新聞專業學生的記者角色認知有何影響，即探討不同的新聞教育體系如何塑造未來新聞從業者的觀念。

各地新聞業中實際存在著一種相似的職業意識形態(Deuze, 2005)。在全球共21個國家進行的記者調查顯示，雖然沒有統一的職業標準，但各地新聞從業者具備非常相似的職業認知(Weaver, 1998)，這說明他們經歷了一個非常相似的專業化過程，其中新聞教育便是重要一環。而學生接受新聞教育的過程並非在象牙塔內，正式新聞教育培育未來記者的過程，也是讓學生接觸到那些「威脅、挑戰，但更多是改變著新聞業的社會、文化、專業及經濟方面的趨勢」的過程(Deuze, 2000, p. 80)，由此新聞教育甚至大學教育，實際上成為了社會需求趨勢與學生社會化之間的橋樑。但同時，新聞教育又不僅僅是中介，教育作為一種機制化的過程，是新聞學生所經歷的最集中系統的職業社會化過程，提供給他們成為記者之前的所有職業想像。

在談及理想中的新聞教育應該如何時，傳媒學者都會強調新聞教

育不僅僅是職業教育，而應該審視和批判業界的實踐(潘忠黨，2005；Carey, 2000)。對應然層面的強調滲透在新聞教育的課程中。由此新聞教育的大部分內容，往往會從應然層面上去影響和塑造學生對記者或媒體應該在社會中扮演何種角色的判斷。因此，本文會將考察兩地的新聞教育之差異，及其對於學生的記者角色認知有何影響。

中港兩地新聞教育的差異

在語言文化類似、地理位置接近的中港兩地，新聞教育也有著不同的軌跡。幾位學者將上世紀80年代前兩岸三地的新聞教育分為兩種類型，即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新聞教育」與港臺的「自由主義新聞教育」(陳韜文、羅文輝、潘忠黨，2003)。「社會主義新聞教育」則指以中國大陸從上世紀50年代起以蘇聯為師的新聞教育模式，其模式經過60、70年代仍然強調意識形態多於專業技能(陳韜文、羅文輝、潘忠黨，2003：6-7)。而「自由主義新聞教育」的課程安排則以「社會的多元性、媒介的獨立性和新聞自由的可欲性(desirability)」為前提，意在培養學生的批判能力和專業性(陳韜文、羅文輝、潘忠黨，2003：5)。

這種區分描述了上世紀80年代之前中港兩地新聞教育的差異，但隨著兩地社會轉型，兩地新聞教育也都開始隨之而調整。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中國大陸各高校開始新建新聞學院，西方新聞與傳播的概念與理論在這段時間被引入新聞教育(Greenburg & Lau, 1990)。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媒體市場化趨勢所帶來的對信息傳播與讀者吸引的要求，也反映到新聞教育課程的改革當中，具體體現為新聞系的擴張(Xu, Chu, & Guo, 2002, pp. 66-67)。雖然發展迅猛，但中國大陸新聞教育受到了意識形態與市場化的雙重壓力，兩種壓力之間也存在著張力。一方面，擴張趨勢持續；另一方面，大陸新聞教育的方向仍然嚴格受到國家在意識形態層面的控制，新聞學院仍然需要培養「政治上可靠」的新聞工作者。

而香港新聞教育從上世紀80年代後期才開始急速普及，以美國為師，香港新聞教育以自由主義與專業性理念為主導，但香港媒體本身的商業化趨勢對於新聞教育也產生壓力(陳韜文、羅文輝、潘忠黨，

2003: 8)。香港回歸前的一項記者調查研究表明，雖然所屬媒體有著不同的意識形態區隔與派別劃分，但記者皆認同專業主義操作手法，即使對某些原則或理念的解讀不同(Chan, Lee, & Lee, 1992; Lee, Chen, Chan, & Lee, 1996)。香港回歸後，儘管由於政治管制、自我審查與市場競爭的壓力，出現了新聞業可信度評價普遍降低的情況(陳韜文、羅文輝、潘忠黨，2003；So & Chan, 2007)，但似乎還未影響到新聞課堂中對專業主義的強調。

已有的新聞從業者調查，雖然一般都會測量新聞人員的教育水準，但較少考察新聞傳播教育對新聞人員角色認知的影響。一個例外是對中港臺三地的比較研究(羅文輝、陳韜文等，2004)，他們的研究探討了新聞教育對中港臺從業者的記者角色認知有何影響，設立了兩個關於新聞教育的變量，一個是整體教育(是否接受過大學教育)；另一個是專業教育(是否主修新聞或傳播)(陳韜文、羅文輝、潘忠黨，2003)。而本研究的樣本僅限高校全日制新聞系學生，以上這兩個變量便體現不了區分度，由此本文作者設計了其他關於新聞傳播教育內容的題項，如學生所接受新聞教育的目的、各類課程的比例等題項，由此構建新聞教育相關變量。

本文的第二組研究問題即是：在預測大陸、香港新聞專業學生對記者角色的認知的不同預測變量中，新聞教育變量對記者角色認知的預測力，是否比其他層次變量的預測力更強？本研究將首先測量大陸與香港新聞專業學生對所處新聞學院的課程安排的看法，以及他們如何看待新聞教育目的；其次來看這些新聞教育變量對學生記者角色認知的預測力。

其他具有預測力的因素：社會因素與個人因素

本文通過比較研究，除了探討新聞教育對學生認知的影響之外，還將考察不同社會環境中其它因素是如何發揮「形塑」作用的。新聞教育並不完全與新聞業界同聲同氣，「新聞教育固然可以影響新聞文化，但學生進入業界工作後，可能被現實同化，沖淡新聞教育的影響」(陳韜文、羅文輝、潘忠黨，2003: 11)。一項對比英國與西班牙的比較研

究顯示，兩國的學生與本國記者的認知較為一致，這說明學生在接受新聞教育之前，已經受到本國的新聞業「文化」(journalistic “cultures”)的影響(Sanders, Hanna, Berganza, & Aranda, 2008)。

同時，新聞教育不可能絕緣於社會而自成一體，「新聞教育，媒介體制與社會制度是相互影響的」(陳韜文、羅文輝、潘忠黨，2003：11)。學生在接受新聞教育的同時，也受到所在社會對新聞業的文化理解(cultural understanding of journalism)之影響，更不用說生活中頻繁接觸媒介的日常經驗(Sanders et al., 2008)。香港與大陸兩地的新聞業，存在著不同的新聞報道手法與新聞文化。新聞學生作為一個社會人或普通新聞受眾，都耳濡目染受到這些因素影響。此外，新聞學生被期待是更經常接觸政治類新聞的一群人，因為應然地來講，這不只是他們作為知悉公民(informed citizenry)的義務，還應該是為了日後成為新聞分析者、新聞編輯者這一重要職能做全面的準備工作(Spyridou & Veglis, 2008)。除此之外，實習也為學生提供接觸正式新聞工作的機會，這樣一來他們會更直接受到業界影響，從而可能改變原有的記者角色認知。

除了兩地新聞業的不同之外，中港社會也存在對很多問題的認知差異。本文為同時測量兩地學生的相關態度，會詢問兩個群體分別對愛國主義持何種態度，具體而言是想看兩地學生分別對作為一個抽象概念的國家有多大程度的情感寄託、正面態度、責任感，以及將國家利益置於個人之上的動機(Fairbrother, 2003)。該變量會也作為記者角色認知的預測變量。

本文的第三組研究問題即是：在預測大陸、香港新聞專業學生對記者角色的認知的不同預測變量中，社會變量與個人變量對學生的記者角色認知有多大的預測力？社會變量即中港兩地不同的社會環境；個人因素的內容比較多，比如我們會測量學生是否參與正式機構的實習、選擇新聞業的動機、認為新聞教育的目標為何、媒介使用習慣、政治新聞使用習慣、及其接受愛國觀念的程度。

研究方法

數據收集

按照重複測量設計的原則，研究者時隔6年對相同的樣本群體使用了一致的問卷進行調查，並採用定性文獻研究與訪談來配合數據分析。在這六年當中，大陸與香港的新聞業皆發生了不少變化：大陸的傳媒觀察者觀察到，從2008年金融風暴起，這六年間不僅出現以報紙為代表的傳統傳媒業的衰退，還發生了行業價值感與「光環」的消退(宋志標，2013)；與此同時的香港傳媒業，則出現了傳媒外部受政治壓力影響新聞自由，與內部進行自我審查的現象。六年間隔的數據差異，應能較為充分地體現出，中港社會傳媒業的變化對新聞學院學生的影響。

在兩次問卷收集過程中，研究者採用了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中的同質性抽樣(homogeneous sampling)的方法，主要選取兩地較為知名及培養畢業生在學界與業界都有著良好聲譽的新聞學院，每所新聞院校中選擇30–60名專業為新聞學的學生回答問卷。在選擇大陸地區的新聞院系時，由於北京的高校集中，在京院系佔到了總數的一半或以上。除了專業要求外，樣本皆選擇二年級以上的學生，因為剛入學的大一新生尚未接受專業課訓練，對整體課程安排瞭解也不深。收集問卷的方法，一般是請求該學院任課教師在課堂間或課後分發給一個班級的學生，收集後統一由研究助理錄入。

本研究的數據組成有兩部分。第一部分是2014年對中國大陸與香港地區的新聞專業學生進行的問卷調查。問卷收集時間從2014年9月初至10月底。總共有595名中國大陸與香港的新聞學院本科生回答了這些問卷。其中，327名學生來自大陸的9所高校(北京的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政法大學、中國傳媒大學，以及4所其他省份的大學)，268名學生來自香港的4所高校(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浸會大學以及香港樹仁大學)。

這些學生中超過7成為女性，不到3成為男性。其中，54.5%的學生年齡集中在20–21歲，25.5%的學生年齡集中在18–19歲，其餘17.8%

的年齡集中在22-23歲。大三學生佔總人數的52.9%，大二學生佔36%，大四學生佔10.3%。政治面貌方面，大陸學生中的80.4%為共青團員，12.2%為中共黨員，其餘5.8%為無黨派人士。香港學生中的47.4%表示，即使有機會也不會參與投票；19.8%的港生表示會將票投給公民黨，13.1%表示會投給社民連。此外，所有學生中參與過實習的有22.7%，未參與過實習的佔76.8%。

第二部分數據來自2008年實施的對中港兩地新聞學生的問卷調查(Deng & Ma, 2009)。這次問卷收集時間為2008年11月至12月。當時總共有697名中國大陸與香港的新聞學院本科生回答了這些問卷。其中，449名來自大陸的6所高校(北京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以及3所其他省份的大學)，248名來自香港的3所高校(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城市大學以及香港樹仁大學)。

這些學生由180名男性與509名女性構成。超過一半的學生年齡為20-21歲，16.5%的學生為18-19歲，19.9%的學生為22-23歲。其中，47.6%為大二學生，40.9%為大三學生。政治面貌方面，大陸學生中的78.2%是共青團員，16.9%是中共黨員，其餘4.9%為無黨派人士。29.5%的香港學生表示即便他們有機會也不會參與投票。約14.9%的香港學生表示他們將會為民主黨投票，另有16.6%的香港學生表示會把票投給公民黨。

測量

I. 新聞教育變量

對新聞教育目的的認知：受訪者對所接受新聞教育之目的進行評價，他們需要分別評價以下兩條關於新聞教育目的之論述：「為國家提供宣傳幹部和傳媒工作者、教師和研究人員」，「為社會培養傳媒工作者、教師和研究人員」，此處採用Likert 5點量表，1表示「非常贊同」，5表示「非常不贊同」。

對各類課程比重的認知：受訪者被問及所屬新聞學院中開設思想教育、專業技術培訓(採寫編評)、通識教育、思維訓練、多媒體

課程(廣播、電視、新媒體)這五類課程分別所佔全部課程之比重。此處採用Likert 5點量表, 1表示「最少」, 5表示「最多」。

II. 社會變量

社會變量:本研究只將社會變量作所在地區之區分, 即區分為大陸與香港兩個樣本。

III. 個人變量

實習經歷:此處要求受訪者選擇曾經接觸過的最主要的新聞工作, 包括校園報紙或電臺、課堂練習、正式新聞機構、媒體通訊員。

愛國觀念:此處採用Likert 5點量表, 1表示「非常贊同」, 5表示「非常不贊同」。受訪者需要回答:(1)愛國主義的重要性,(2)作為一名中國人感到很自豪,(3)對涉及中國名譽及利益的國際事件表示關注,(4)購買中國生產的產品,(5)對中國文化有興趣和(6)支持留學海外的大學生完成學業後回到祖國服務。該項變量的信度係數為.82。

各類新聞接觸程度:受訪者被問及對下列新聞的接觸程度:政治新聞, 財經新聞, 社會新聞, 文化新聞, 娛樂新聞, 以及體育新聞。此處採用Likert 5點量表, 1表示「從不」, 5表示「總是」。

對各類政治新聞的關注:受訪者被問及對下列新聞的關注程度:批評政府, 解釋政府政策, 政治事件, 政治人物特寫或訪談, 以及政治評論。此處採用Likert 5點量表, 1表示「最少」, 5表示「最多」。在使用因素分析與題項分析之後, 研究者將五個題項建構成兩個複合式變量, 一個是「政治硬新聞」, 由批評政府、解釋政府政策、政治事件這三個題項組成, 該項變量的信度係數為.59, 另一個是「政治軟新聞」, 由政治人物特寫或訪談、政治評論這兩個題項組成, 該項變量的信度係數為.55。

媒介使用情況:此處採用定距量表來測量在不同類型媒體上所花費的時間。

個人資料:受訪的學生需填寫就讀大學名稱, 年齡, 性別, 年級。大陸學生需填寫政治面貌, 香港學生需填寫投票時的政治傾向。

IV. 學生對記者角色的認知

問卷通過24項題項，詢問學生其中所列的24項媒介社會功能重不重要，讓受訪者從Likert 5點量表中選擇一個答案，1表示「非常不重要」，5表示「非常重要」。數值越高，表明受訪者認為該項媒介功能越重要。

數據分析採用主成分因素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factor analysis)與Cronbach's alpha兩種方法來檢驗這些題項的信度和效度，表一顯示分析的結果。因素分析的結果發現，這些題項呈現六個因素。其中題項(19)減少政府批評，(20)犧牲媒介自由，(21)對政府有同情心，(22)考慮政府權威，(23)避免抹黑中國/避免唱衰香港，(24)避免分裂社會，成為第一個因素「應和者」，這個因素可解釋25.75%的變異量。建構「應和者」角色的方法是將這六個題項加以來除以6(Cronbach's alpha = .93，平均數為1.96，標準差為.86)。

第二個因素「解釋政府政策」，由下列四個題項組成：(6)解釋政府政策，(7)幫助瞭解政策，(5)討論發展政策，(4)提供分析解釋。這個因素可以解釋19.83%的變異量，建構「解釋政府政策」角色的方法，仍是把這四個題項加起來除以4(Cronbach's alpha = .80，平均數為3.79，標準差為.70)。「解釋政府政策」和Weaver與Wilhoit(1986)提出的解釋/調查角色不同，系指對政府和政黨政策提出解釋，幫助民眾瞭解。

(16)質疑政府言行，(17)質疑企業言行，(18)質疑社會團體，成為第三個因素「對立」，這個因素可解釋8.77%的變異量。建構「對立」角色的方法是把這三個題項加起來，並除以3(Cronbach's alpha = .95，平均數為3.58，標準差為.85)。「對立」和Weaver與Wilhoit(1986)的媒介對立角色相同。

第四個因素包括五個題項：(10)成為民眾喉舌，(11)推動社會改革，(9)實行輿論監督，(8)引導公眾輿論，(12)聲援弱勢團體。這個因素的主要意涵為「鼓吹民意」，可解釋5.43%的變異量，把這五個題項加起來，並除以5，建構成「鼓吹民意」角色(Cronbach's alpha = .76，平均數為3.70，標準差為.70)。「鼓吹民意」意指媒介應扮演引導民意、推動社會改革、聲援弱勢團體與實行輿論監督等角色。

主成分因素分析顯示，題項(2)依據事實報導，(1)迅速提供資訊，(3)阻止流言散播，形成第五個因素「資訊散佈」，這個因素可以解釋5.14%的變異量，建構「資訊散佈」角色的方法，也是把這三個題項加起來除以3 (Cronbach's alpha = .80，平均數為4.45，標準差為.66)。這種角色也和Weaver與Wilhoit (1986)的資訊散佈角色相同。

最後一個因素「文化與娛樂」，由三個題項組成：(15)提供娛樂休閒，(14)提升知識文化，(13)報導最多群眾感興趣的新聞。這個因素可解釋4.50%的變異量，建構「文化與娛樂」角色的方法，是把這三個題項加起來除以3 (Cronbach's alpha = .66，平均數為3.38，標準差為.73)。「文化與娛樂」意指媒介應提升民眾的文化水準，並提供娛樂與休閒。

如表一所示，本研究測量新聞學生對記者角色認知的二十四個題項，經主成分因素分析及Cronbach's alpha檢定後，建構成六種記者角色：「應和者」、「資訊散佈」、「解釋政府政策」、「鼓吹民意」、「文化娛樂」、「對立」。

表一 新聞系學生對於媒介角色認知的主成因分析

媒介角色	Component					
	1	2	3	4	5	6
應和者						
為社會穩定減少對政府批評	.78	.03	-.01	.09	-.13	.16
為大局可以犧牲媒介自由	.81	.12	.05	-.08	-.13	.06
批評政府時留有同情心	.83	.00	.01	.01	-.02	.05
為政府的權威著想，減少媒介批評	.92	.01	-.03	-.01	-.17	.03
為避免抹黑中國/唱衰香港，減少媒介批評	.89	-.07	-.02	-.01	-.05	.08
為不分裂社會，減少媒介批評	.87	-.07	-.04	-.01	.02	.05
解釋政府政策						
對複雜的問題提供分析與解釋	.02	.76	.09	.15	.18	.02
對形成過程中的政策展開討論	-.06	.74	.14	.23	.07	.11
對政府的政策做出解釋	.11	.72	.04	.16	.15	.14
幫助市民瞭解政府的政策	-.08	.66	.05	.24	.31	.14

表一(續)

對立						
質疑並批評政府官員的言行	-.05	.14	.89	.20	.08	.14
質疑並批評工商業的言行	-.02	.11	.93	.18	.10	.07
質疑並批評社會團體的言行	.02	.12	.93	.16	.04	.10
鼓吹民意						
引導公眾輿論	.09	.14	-.00	.49	.06	.51
幫助市民實行輿論監督	-.12	.13	.09	.60	.32	.19
成為市民的喉舌	.04	.10	.25	.74	.03	.13
推動社會改革	-.01	.37	.13	.72	-.01	-.01
聲援社會弱勢團體	.01	.31	.21	.63	.19	.04
資訊散佈						
迅速地為大眾提供新的資訊	-.13	.13	.04	.15	.79	.18
依據事實報導新近發生的事件	-.15	.20	.10	.14	.85	.09
報導可靠資訊以阻止流言的散播	-.15	.37	.10	.05	.70	-.08
文化與娛樂						
報導最大多數市民感興趣的新聞	.21	-.01	.08	.15	.11	.76
教育群眾，提高他們的知識與文化	.02	.47	.24	.11	.09	.46
為市民提供娛樂和休閒	.12	.26	.16	.04	.04	.75
愛根值	6.18	4.76	2.10	1.30	1.23	1.08
可解釋變異量	25.75%	19.83%	8.77%	5.43%	5.14%	4.50%
全部可解釋變異量	69.42%					
Cronbach's alpha	.93	.80	.95	.76	.80	.66

研究發現

兩地學生對記者角色認知的對比與六年間的變化：
以「應和者」為例

本研究第一組研究問題，是來看這六年來兩地學生對記者或新聞媒介應該在社會中扮演何種角色的認知。整體而言，兩地學生對「資訊

散佈」、「解釋政府政策」、「鼓吹民意」、「文化娛樂」、「對立」這五種角色的評價數值都超過了平均數，其中「資訊散佈」的數值最高，均值超過了4；而只有對「應和者」的數值低於均值，其中以2014年香港學生的評價最低，低過了2(表二)。這說明，學生在想像未來職業時，會更認同前五種傾向於「正面」描述記者的職能，而較為反感有關「應和者」的題項中用到的「避免(分裂)」或「減少(媒介自由)」等「負面」描述。

2014年的數據顯示兩地學生最為認同的記者角色非常相似。就單個題項而言，香港學生與大陸學生所評價最重要的三個記者角色及其順序完全一致，分別為：依據事實報導、迅速提供資訊、阻止流言散播；兩地學生認為最不重要的記者角色及其順序也一致，分別為：為大局犧牲媒介自由、考慮政府權威，以及避免抹黑中國/香港。

而中港學生對記者角色認知也存在著差異，六年間兩地的差異也發生了變化，這最主要體現在對「應和者」這個角色的認同上。將2014年的中港學生對媒介角色的認知差異(表二)與2008年的中港學生認知差異(表三)作一比較，2008年大陸學生對「應和者」的認同低於香港學生($t = -2.66, p < .01$)；而在2014年香港學生對「應和者」的認同低於大陸學生($t = 6.23, p < .001$)。再來分別對比時隔六年的大陸學生數據(表四)與時隔六年的香港學生數據(表五)，可發現六年間兩地學生對記者的「應和者」角色認同都顯著降低，大陸學生的認同的均值由2.33降低到2.16($t = 2.80, p < .01$)，而香港學生的認同降幅更大，均值由2.52降為1.73($t = 10.44, p < .001$)。

而考察教育變量，可發現兩地學生對新聞教育之目的是「為國家」培養人才的認同與對「應和者」角色認知的變化有相同之處。從表六和表七可以看出，雖然兩次調查的結果都顯示，香港學生比大陸學生，更不同意新聞教育之目的是「為國家」培養人才，但2014年的兩地差異要大於2008年的兩地差異。相比起大陸學生的這一認知在六年間無顯著變化(表八)，香港學生對這一變量的認同顯著降低，由均值2.61降低到2.22($t = 4.36, p < .001$)(表九)。

同時考察個人變量，可發現兩地學生對「愛國觀念」的認知也與前兩者的變化有相同之處。兩次問卷調查的數據都顯示，大陸學生比香港學生更愛國。但六年來，兩地的學生的愛國觀念都顯著降低，大陸

學生的均值由4.28降到3.95 ($t = 6.49, p < .001$)；香港學生從3.38降到了2.86 ($t = 10.06, p < .001$)。

有關這三個變量，除了兩地差異及歷時變化的相似之外，它們之間的相關關係也由回歸分析的結果有所體現。對2014年兩地數據進行階層回歸分析(Hierarchical multiple regression)(表十)，可見後兩個變量可部分解釋「應和者」角色認同變量的變化。在大陸與香港兩個樣本中，認為新聞學教育的目標是「為國家」培養人才這一變量，對於「應和者」這一角色都有正向預測力(Beta值分別為.19與.25)。而「愛國觀念」的變量，它在大陸學生的樣本中對「應和者」這一記者角色呈負向預測力(Beta值為-.13)；在香港學生樣本中對「應和者」這一記者角色呈正向預測力(Beta值為.21)。

綜上所述，兩地學生對「應和者」記者角色、對新聞教育是「為國家」培養人才與「愛國觀念」的認知，這三個變量在六年間的變化出現了較為一致的模式，尤其以香港學生對三者認同的顯著降低最為明顯。這一部分原因可能來自於2014年的問卷收集時間，正值香港學生罷課參與佔領中環運動時期，作為事件參與者與被報道的對象，他們當時對新聞報道的關注非常集中，也對媒體的操作手法產生了更多更尖銳的意見與評價；而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認這六年間長期累積的原因在起作用，若考查香港的新聞文化，可發現民眾也越發意識到傳媒中存在審查與自我審查，這段時間內作為一般讀者的新聞學生自然也會對「應和者」題項中的描述更產生反感。而香港學生對國家與愛國的認同變化，也與一般港人對國家的認知變化相關。與本文兩次問卷調查時間基本同步的相隔六年的香港民意調查顯示，在詢問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時，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比例從21.8%上升至40.2%，而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從34.4%下降至19.5%(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2014)。因此，六年間的香港社會整體變化與2014年佔中事件都可部分解釋這三個變量的變化趨勢。

此外，除了對「應和者」的認同差異變化顯著之外，2008年大陸學生對「資訊散佈」($t = 5.42, p < .001$)和「鼓吹民意」($t = 2.63, p < .01$)的認同強過香港學生；而在2014年這些差異不復存在。

表二 中港新聞學生對媒介角色的認知差異 (2014年)

變量	大陸 (樣本數為 327)	香港 (樣本數為 268)	t-VALUE
應和者	2.16 (.87)	1.73 (.79)	6.23***
解釋政府政策	3.80 (.78)	3.79 (.59)	.23
對立	3.54 (.85)	3.63 (.84)	-1.36
鼓吹民意	3.69 (.81)	3.71 (.59)	-.33
資訊散佈	4.47 (.72)	4.42 (.57)	.95
文化與娛樂	3.30 (.81)	3.48 (.59)	-3.15**

註：表中數字為平均數，括號中的數字為標準差。* $p < .05$, ** $p < .01$, *** $p < .001$ 。

表三 中港新聞學生對媒介角色的認知差異 (2008年)

變量	大陸 (樣本數為 449)	香港 (樣本數為 249)	t-VALUE
應和者	2.33 (.86)	2.52 (.92)	-2.66**
解釋政府政策	3.86 (.77)	3.82 (.59)	.60
對立	3.60 (1.04)	3.72 (.75)	-1.68
鼓吹民意	3.87 (.80)	3.73 (.62)	-2.63**
資訊散佈	4.38 (.80)	4.08 (.65)	5.42***
文化與娛樂	3.55 (.84)	3.60 (.64)	-1.01

註：表中數字為平均數，括號中的數字為標準差。* $p < .05$, ** $p < .01$, *** $p < .001$ 。

表四 中國大陸新聞學生對媒介角色認知的歷時差異：2008 vs 2014

變量	2008 (樣本數為 449)	2014 (樣本數為 327)	t-VALUE
應和者	2.33 (.86)	2.16 (.87)	2.80**
解釋政府政策	3.86 (.77)	3.80 (.78)	.98
對立	3.60 (1.04)	3.54 (.85)	.96
鼓吹民意	3.87 (.80)	3.69 (.81)	3.20**
資訊散佈	4.38 (.80)	4.47 (.72)	-1.65
文化與娛樂	3.55 (.84)	3.30 (.81)	4.17***

註：表中數字為平均數，括號中的數字為標準差。* $p < .05$, ** $p < .01$, *** $p < .001$ 。

表五 香港新聞學生對媒介角色認知的歷時差異：2008 vs 2014

變量	2008 (樣本數為 248)	2014 (樣本數為 268)	t-VALUE
應和者	2.52 (.92)	1.73 (.79)	10.44***
解釋政府政策	3.82 (.65)	3.79 (.59)	.63
對立	3.72 (.75)	3.63 (.84)	1.26
鼓吹民意	3.73 (.62)	3.71 (.62)	.34
資訊散佈	4.08 (.65)	4.42 (.57)	-6.34***
文化與娛樂	3.60 (.64)	3.48 (.59)	2.33*

註：表中數字為平均數，括號中的數字為標準差。* $p < .05$, ** $p < .01$, *** $p < .001$ 。

中國大陸與香港新聞學生對記者角色認知的比較研究 (2008–2014)

表六 中港學生對新聞教育的認知差異 (2014年)

變量	大陸 (樣本數為 327)	香港 (樣本數為 268)	t-VALUE
對新聞教育目的的認知			
為國家提供宣傳幹部和傳媒工作者、教師和研究人員	2.90 (1.16)	2.22 (1.07)	7.47***
為社會培養傳媒工作者、教師和研究人員	3.78 (1.02)	3.65 (.94)	1.59
對各類課程比重的認知			
政治意識形態的培訓	2.43 (1.07)	2.37 (1.05)	.70
專業技術的培訓 (採寫編評)	3.87 (.95)	3.90 (.93)	-.40
通識教育	3.61 (.92)	3.59 (.91)	.29
思維訓練	2.96 (1.13)	3.76 (.88)	-9.65***
多媒體課程 (廣播、電視、新媒體)	3.46 (1.04)	4.01 (.85)	-7.05***

註：表中數字為平均數，括號中的數字為標準差。* $p < .05$, ** $p < .01$, *** $p < .001$ 。

表七 中港學生對新聞教育的認知差異 (2008年)

變量	大陸 (樣本數為 449)	香港 (樣本數為 249)	t-VALUE
對新聞教育目的的認知			
為國家提供宣傳幹部和傳媒工作者、教師和研究人員	2.98 (1.18)	2.62 (.99)	4.26***
為社會培養傳媒工作者、教師和研究人員	3.76 (1.06)	3.52 (.89)	3.20**
對各類課程比重的認知			
政治意識形態的培訓	2.85 (1.11)	2.68 (.97)	2.15*
專業技術的培訓 (採寫編評)	3.56 (1.03)	3.81 (.77)	-3.62***

表七(續)

通識教育	3.53 (1.06)	3.51 (.83)	.35
思維訓練	2.96 (1.10)	3.34 (.91)	-8.42***
多媒體課程(廣播、電視、新媒體)	2.83 (1.03)	3.47 (.92)	-8.44***

註：表中數字為平均數，括號中的數字為標準差。 $*p < .05$, $**p < .01$, $***p < .001$ 。

表八 中國大陸新聞學生對新聞教育認知的歷時差異：2008 vs 2014

變量	大陸 (樣本數為 449)	大陸 (樣本數為 327)	t-VALUE
對新聞教育目的的認知			
為國家提供宣傳幹部和傳媒工作者、教師和研究人員	2.98 (1.18)	2.90 (1.16)	.89
為社會培養傳媒工作者、教師和研究人員	3.76 (1.06)	3.78 (1.02)	-.30
對各類課程比重的認知			
政治意識形態的培訓	2.85 (1.11)	2.43 (1.07)	5.31***
專業技術的培訓(採寫編評)	3.56 (1.03)	3.87 (.95)	-4.27***
通識教育	3.53 (1.06)	3.61 (.92)	-1.09
思維訓練	2.96 (1.10)	2.96 (1.13)	-3.40**
多媒體課程(廣播、電視、新媒體)	2.83 (1.03)	3.46 (1.04)	-8.28***

註：表中數字為平均數，括號中的數字為標準差。 $*p < .05$, $**p < .01$, $***p < .001$ 。

表九 香港新聞學生對新聞教育認知的歷時差異：2008 vs 2014

變量	香港 (樣本數為 248)	香港 (樣本數為 268)	t-VALUE
對新聞教育目的的認知			
為國家提供宣傳幹部和傳媒工作者、教師和研究人員	2.61 (.99)	2.22 (1.07)	4.36***
為社會培養傳媒工作者、教師和研究人員	3.52 (.89)	3.65 (.94)	-1.71
對各類課程比重的認知			
政治意識形態的培訓	2.68 (.97)	2.37 (1.05)	3.42**
專業技術的培訓 (採寫編評)	3.81 (.77)	3.90 (.93)	-1.14
通識教育	3.51 (.84)	3.59 (.91)	-1.03
思維訓練	3.35 (.90)	3.76 (.88)	-5.25***
多媒體課程 (廣播、電視、新媒體)	3.48 (.92)	4.01 (.85)	-6.81***

註：表中數字為平均數，括號中的數字為標準差。* $p < .05$, ** $p < .01$, *** $p < .001$ 。

表十 對媒介角色認知變量的階層回歸分析(2014年)

	應和者		解釋政府政策		對立	
	大陸	香港	大陸	香港	大陸	香港
各類新聞接觸程度						
政治新聞	.03	-.08	-.00	.01	.02	-.16*
財經新聞	.08	.00	.02	.02	-.00	.11
社會新聞	.07	.05	.06	-.02	-.02	.06
文化新聞	.01	-.08	.09	-.09	.01	.04
娛樂新聞	.13*	.09	-.00	-.01	.09	.03
體育新聞	.01	.05	-.08	-.00	-.11	-.08
Adjusted R ² for 1 st Model	.02	.05	.07	.02	.00	.01
各類政治新聞接觸程度						
政治硬新聞	-.31***	-.15*	.14*	.15*	.04	.10
政治軟新聞	.13*	.01	.05	.08	.02	.12
Adjusted R ² for 2 nd Model	.09	.07	.11	.06	.00	.02
愛國觀念						
	-.13*	.21**	.17**	.08	.08	-.10
Adjusted R ² for 3 rd Model	.09	.12	.13	.07	.01	.02
對新聞教育目標的認知						
為國家	.19**	.25***	-.00	.01	-.13*	-.07
為社會	-.03	-.08	.11	.06	.14*	.05
Adjusted R ² for 4 th Model	.13	.19	.14	.07	.02	.02
對各類課程比重的認知						
政治意識形態的培訓	.13*	.10	.14*	.09	.04	-.04
專業技術的培訓 (採寫編評)	.01	-.12	-.05	.05	.09	.04
通識教育	-.07	-.01	-.02	.13	-.10	-.03
思維訓練	.08	-.07	.14*	-.08	.10	-.01
多媒體課程(廣播、電視、新 媒體)	.14*	.03	.05	.11	.03	.02
整體 Adjusted R ²	.16	.21	.16	.09	.03	.05

表十(續)

	鼓吹民意		資訊散佈		文化與娛樂	
	大陸	香港	大陸	香港	大陸	香港
各類新聞接觸程度						
政治新聞	-.03	-.07	-.00	.15*	-.12	-.15*
財經新聞	.02	.05	.01	-.16*	.10	.05
社會新聞	-.03	.04	.01	-.01	.08	-.04
文化新聞	.02	-.02	.07	-.09	.03	-.05
娛樂新聞	.03	.07	-.13*	-.03	.14*	.10
體育新聞	.02	-.08	.02	-.06	-.10	-.08
Adjusted R ² for 1 st Model	.06	.00	.08	.04	.08	.03
各類政治新聞接觸程度						
政治硬新聞	.08	.12	.16**	.07	-.09	.19*
政治軟新聞	.15**	.23**	-.06	.06	.16**	.07
Adjusted R ² for 2 nd Model	.12	.07	.13	.05	.11	.07
愛國觀念						
	.23***	-.03	.28***	.10	.18**	.10
Adjusted R ² for 3 rd Model	.18	.07	.21	.06	.15	.08
對新聞教育目標的認知						
為國家	.05	.09	-.01	-.08	.13*	.14*
為社會	.09	-.04	.14*	.16**	-.02	-.10
Adjusted R ² for 4 th Model	.19	.06	.23	.09	.17	.09
對各類課程比重的認知						
政治意識形態的培訓	.10	-.01	.04	-.04	.09	.03
專業技術的培訓 (採寫編評)	.06	.03	.12*	.16*	.05	.12
通識教育	-.08	.10	.09	-.13	-.05	.09
思維訓練	.14*	-.08	.11	.11	.09	-.17*
多媒體課程(廣播、電視、新 媒體)	.05	.03	-.00	.12	.14*	.16*
整體 Adjusted R ²	.21	.06	.25	.14	.20	.14

註：表格數值為 Beta 值。* $p < .05$, ** $p < .01$, *** $p < .001$ 。

預測變量1：教育變量

本文提出的第二組研究問題主要探討新聞教育變量對記者角色認知的預測力。首先來看大陸與香港新聞專業學生對所處新聞學院的課程安排的看法，以及他們如何看待新聞教育目的。數據顯示，兩地學生在兩次調查中都更為認同新聞教育的目的是「為社會」而甚於「為國家」培養人才。2014年的調查顯示，兩地學生對「為社會」一項無顯著差異(表六)；而兩次調查都顯示，香港學生對「為國家」的認同顯著低於大陸學生。對於所在學院的課程內容比重，從表六和表七可以看出，相隔六年的大陸和香港兩地的新聞學生，對各類課程比重的感受有相同的變化：意識形態的課程減少，思維訓練的課程增多，多媒體課程增多。時隔六年，大陸學生認為專業技術訓練的課程顯著增多，香港則無變化。而兩地相較，2008年時，香港學生認為所在學院開設的專業技術訓練、思維訓練、多媒體課程的比例，高於大陸學生對所在學院的評估；而意識形態課程則是大陸高於香港。到2014年，兩地的顯著區別只剩下思維訓練、多媒體課程這兩項，皆為香港學生的評估高出大陸學生，尤其香港學生認為多媒體課程所佔份量最重(均值為4.01)。

前文已提及，根據回歸分析的結果，在大陸與香港兩個樣本中，認為新聞教育的目標是「為國家」培養人才這一變量，對於「應和者」這一角色都有正向預測力(Beta值分別為.19與.25)；而在中港兩個樣本中，認為新聞學教育目標是「為社會」這一變量，對於「資訊散佈」這一角色都有正向預測力(Beta值分別為.14與.16)。同樣以「應和者」為因變量，還可以發現，相似的相關關係也存在于學生對某些課程比重的認知變量與該媒介角色認知變量之間：「政治意識形態培訓」課程的變量，在大陸學生的樣本中對「應和者」角色有正向預測力(Beta值為.13)，在香港學生樣本中無預測力；而「專業技術培訓」的變量，對大陸與香港學生對「資訊散佈」這一角色的認知都有正向預測力(Beta值分別為.14與.16)。

以上這兩組相似的相關關係，顯示出學生的媒介角色認同，與其對新聞教育目標的應然性認識有關係，也與其實際所接受的課程內容

有關，而後二者之間也存在聯繫。後兩組作為預測變量的新聞教育變量，它們之間的相關係數也是顯著的：大陸學生當中評估意識形態課程比重較大的，更認同新聞教育目標是「為國家」培養人才；而兩地學生當中評估專業技術培訓比重較大的，更認同新聞教育目標是「社會」培養人才。可見作為學生，他們對教育目標認知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也來自其所接受專業課程的訓練，以及這些課程內容所蘊含的應然性原則。

預測變量2：個人變量

本文的第三組研究問題探討的是社會變量與個人變量對學生的記者角色認知有多大的預測力。大陸與香港學生的媒介使用習慣有所不同。2014年香港學生相較於大陸學生，花了更多時間通過電視、廣播、報紙來看新聞；但兩地學生看新聞花時間最多的渠道都是網絡，差距並不顯著。而看新聞的種類也有多項顯著差異：2014年香港學生比大陸學生看政治新聞、社會新聞更多；大陸學生看經濟類新聞、文化、娛樂與體育新聞更多。六年來變化最大的一項是看政治新聞的時間，2008年兩地學生無顯著差異，六年間大陸學生看政治新聞的時間顯著減少，而香港學生則顯著增多。這一對比，能夠多少反映出在兩地社會環境的影響下，兩地新聞文化出現的一些變化：一方面是香港社會日益政治化，香港學生愈發關注甚至參與政治事件；另一方面則是中國大陸的政治新聞報道常年受限，繼而產生了一種去政治化的新聞文化。

而在不同種類的政治新聞當中，2008年時，香港學生僅比大陸學生看了更多的「批評政府作為」的新聞，而大陸學生看了更多的「政治事件追蹤」與「政治人物特寫」的新聞。與之相較，2014年香港學生比大陸學生看了更多的「批評政府作為」、「解釋政府政策」與「政治事件追蹤」的新聞，其中第一項看「批評政府作為」的新聞的時間，兩地差距最大。這種變化，再加上六年間香港學生看政治新聞時間的增加，可以看出香港政治氛圍日益濃厚及學生政治參與程度不斷加深。

最後來看學生對政治新聞的接觸如何影響記者角色認知。研究者已將五個題項建構成「政治硬新聞」與「政治軟新聞」這兩個變量，這兩種政治新聞的類型，分別對應著提供新聞事實或信息、提供意見或人物特寫這兩類新聞文本類型。2014年數據顯示，在兩地學生的樣本中，看「政治硬新聞」的時間這一變量，對「應和者」這一記者角色認知皆有負向預測力(Beta值分別為-.31與-.15)，對「解釋政府政策」這一記者角色皆有正向預測力(Beta值分別為.14與.14)。而在兩地學生樣本中，看「政治軟新聞」時間這一變量，對「鼓吹民意」這一記者角色皆有正向預測力(Beta值分別為.15與.23)。結合此前的描述性數據可發現，即使香港學生較之大陸學生看政治新聞時間更長，看政治硬新聞更多，但兩個樣本中皆出現相似的結論：硬新聞的常規受眾更不同意為了維護政治權威而減少事實或信息批露，更支持對政策提供分析梳理；而軟新聞的常規受眾則傾向於認為，媒體應當充當啟發民意、推動社會變革的角色。

結論與建議

作為比較研究，本文探討兩個變遷社會的新聞文化如何折射在新聞教育當中，並通過新聞學生的社會化過程，影響他們對未來職業角色的認知。以中港兩地新聞環境為基礎，本文在原有五種記者角色認知變量基礎上，提出新的變量即「應和者」角色。這一新的記者角色變量的提出，是因為不同於西方語境，中港兩地新聞文化中難以被人忽視的是媒體與權力的關係，這是兩地記者不同于西方同行的經驗——他們的日常專業實踐中需要隨時面對並處理這一議題。在加入新變量而將記者角色認知測量作本地化處理之後，本研究再來探尋兩地學生存在哪些對媒體角色認知的差異，而這些差異究竟反映了兩地新聞文化的哪些不同。

研究發現的第一部分即描述性分析顯示，兩地學生對原有五種記者角色的看法更趨於一致，而對「應和者」的認同差異卻在六年間變大。而此前兩地記者的數據所顯示的對原有五種記者角色的認知差異(羅文輝、陳韜文等，2004)，並未完全體現在學生樣本中。這說明學

生在進入新聞機構被完全社會化之前，兩地新聞教育對其職業理念的影響是接近的，而差異或許在入行之後產生。而對於新加入的反映媒體與權力關係的變量「應和者」，香港學生的認同大幅降低，其影響因素有二，一是近年來他們作為社會普通讀者對媒體的觀感，二是當下作為佔中運動參與者對媒體報道的切身感受。若調查問卷在佔中運動之前進行，可能測出的只是第一個因素的影響；但在未來一段時間內，第二個因素仍然會持續影響這一批學生，因此本次問卷的數據仍可反映「後佔中時期」的學生認知。

描述性分析還包括對新聞教育的內容與評價進行對比分析。這六年來，兩地的新聞教育中，新媒體課程都增加了比重，這與新聞業中新媒體發展趨勢一致；而學生也都認為受到的專業訓練增多，意識形態訓練變少，這一點在大陸新聞學院更為突出，延續了原有對大陸新聞教育愈加注重專業化的觀察(Xu et al., 2002)。但即使兩地學生對各類課程比重認知這一客觀指標越發接近，同樣課程的具體內容仍有差別，使得學生在評估教學目標「為國家」或「為社會」的程度時，這一主觀指標在兩地仍有顯著差異。

第二部分解釋性分析探討的是哪些預測變量能夠影響學生的記者角色認知。針對不同記者角色認知，新聞教育變量與個人變量綜合發揮著作用。正如前文提到的，兩地的新聞學生不僅是在高校學習的大學生，同時都是深深嵌入社會的個人，也是接觸日常媒介內容的受眾，影響他們認知形成的不止有制度化的教學過程，還有日常生活中的耳濡目染。比如香港本土意識的增強現象，會導致香港學生愛國觀念的變化；而香港學生在看政治新聞時，由於政治體制與媒介體制的的原因，自然會接觸到更多批評政府作為的政治新聞。在中港學生的政治新聞閱讀習慣有所差異的前提下，讀硬新聞與軟新聞的時間長度，在兩個樣本中，對某些記者角色認知變量有著相似的預測力。這說明有著相似新聞閱讀習慣卻接受不同新聞教育的學生，可能會共享某些對記者角色的看法；同樣地，即使在同一個學院接受相同教育的學生，也會因其平時閱讀新聞的偏好，而產生不同的記者角色認知。

本研究選取了兩個時間點來測量兩地新聞學生的記者角色認知，這種橫截面的剖析能夠讓兩地的認知差異得以歷時呈現，從而折射出

六年來兩地新聞教育與新聞文化的變遷。但這種研究設計也限制了本文對新聞學生社會化過程作更全面探討，即對於學生成為記者這一逐漸形成職業認知的過程，只作學校教育階段這一橫截面的截取，未能探討學生社會化過程中更為詳盡的重要環節，比如畢業入行的第一份工作等等。若要對此過程作全面分析，本文贊同「理想的研究設計是對新聞人員進行跟蹤式分析，從就學階段一直跟蹤到就業時期，或對學生和新聞人員進行同期群分析 (cohort analysis)」(陳韜文、羅文輝、潘忠黨，2003：46)。若作這種後續研究，不僅可以探尋學生的社會化過程中的認知變化，還可回答一個問題：學生在新聞學院的社會化，與其進入業界之後的社會化，兩者的方向是背道而馳還是如出一轍？新聞學生在新聞學院的社會化與畢業後在新聞行業的社會化過程存在多大差異？這些問題可能在中港兩個樣本中有不同答案。但理想的同期群分析在操作中可能遇到的最大問題即是，學生樣本變為記者樣本的轉化率不高，國外數據顯示平均只有三分之一的新入職記者來源於新聞學院 (Deuze, 2000)。而中國及香港的比例可能還不及三分之一，而同時新聞學院的畢業生中進入媒體工作的比例也不高，可見新聞學生與記者群體的重合度並不高。這樣收集前期的學生樣本會是一個大規模並嚴格控制的過程，需要受訪者提供一個在未來若干年不會失效的聯繫方式，可能依靠各個新聞學院的校友會是一個可行的辦法。另一種可能的研究設計是將同時期的學生數據與記者數據進行對比，這樣更能夠說明新聞業界與教育界的現存觀念差異，也可反映學生未來入行之後社會化的可能方向。

本研究在設置可能影響學生認知的預測變量時，包括了教育變量與個人變量兩大範疇，而在未來研究的研究中，組成這些預測變量的具體變項設計，還應依據現實變化有所修正。比如，新聞從業者和教育者近年來都強調新媒體課程的必要性，新媒體也早已成為年輕人最常接觸的媒體渠道，他們能夠直觀感受到傳統媒體行業受到新媒體挑戰的媒介生態。而前數十年的從業者調查研究在設計記者角色或媒介角色認知這一變量時，指涉的仍是以專業性取勝的傳統媒體記者，而未來研究或許可探討，隨著新媒體而出現的獨立記者或公民記者，人們期待他們在現代社會的信息傳播過程中扮演何種角色。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 陳韜文、羅文輝、潘忠黨 (2003)。〈傳播教育對新聞人員的影響：大陸、臺灣和香港的比較研究〉。《傳播研究集刊》，第8集，頁1–55。
- Chen Taowen, Luo Wenhui, Pan Zhongdang (2003). Chuanbo jiaoyu dui xinwen ren yuan de yingxiang: Dalu, Taiwan, he Xianggang de bijiao yanjiu. *Chuanbo yanjiu jikan*, 8, 1–55.
- 潘忠黨 (2005)。〈解讀凱里·跨文化嫁接·新聞與傳播之別〉。《中國新聞傳播評論》，第16期(4)，頁4–18。
- Pan Zhongdang (2005). Jiedu Carey, kua wenhua jiajie, xinwen yu chuanbo zhibie. *Zhongguo xinwen chuanbo pinglun*, 16(4), 4–18.
- 羅文輝、陳韜文、潘忠黨 (2001)。〈大陸、香港、臺灣新聞人員對媒介角色的認知〉。《傳播研究集刊》，第6集，頁1–68。
- Luo Wenhui, Chen Taowen, Pan Zhongdang (2001). Dalu, Xianggang, Taiwan xinwen ren yuan dui meiji jiaose de renzhi. *Chuanbo yanjiu jikan*, 6, 1–68.
- 羅文輝 (1998)。〈新聞人員的專業性：意涵界定與量表建構〉。《傳播研究集刊》，第2集，頁1–47。
- Luo Wenhui (1998). Xinwen ren yuan de zhuan yexing: Yihan jieding yu liangbiao jiangou. *Chuanbo yanjiu jikan*, 2, 1–47.
- 羅文輝、陳韜文、潘忠黨、蘇鑰機等 (2004)。《變遷中的大陸、香港、臺灣新聞人員》。臺北：巨流出版社。
- Luo Wenhui, Chen Taowen, Pan Zhongdang, Su Yaoji et al. (2004). *Bianqian zhong de Dalu, Xianggang, Taiwan xinwen ren yuan*. Taipei: Juliu chubanshe.
- 宋志標 (2013年11月5日)。〈大陸媒改運動在崩潰中起步〉。上網日期：2013年12月25日，取自作者個人微信公眾號「舊聞評論」。
- Song Zhibiao (November 5, 2013). Dalu meigai yundong zai bengkuai zhong qibu. Online date: December 25, 2013, from Wechat gongzhonghao *Jiuwen pinglun*.
-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 (2014年9月)。〈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對市民的身份認同感的調查〉。上網日期：2014年10月30日，取自香港大學民意網站，<http://hkupop.hku.hk/english/popexpress/ethnic/eidentity/poll/datatables.html>。
- Xianggang daxue minyi yanjiu jihua (September 2014). Xianggang daxue minyi yanjiu jihua dui shimin de shenfen rentonggan de diaocha. Online date: October 30, 2014. Retrieved from: Xianggang daxue minyi wangzhan, <http://hkupop.hku.hk/english/popexpress/ethnic/eidentity/poll/datatables.html>.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 Carey, J. W. (2000). Some personal notes on US journalism education. *Journalism*, 1(1), 12–23.
- Chan, J. M., Lee, P. S. N., & Lee, C. C. (1998). East meets west: Hong Kong Journalists in transition. In David Weaver (Ed.), *The global journalist: News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pp. 31–54). Cresskill, New Jersey: Hampton Press.
- Chan, J. M., Lee, C. C., & Lee, P. S. N. (1992). Fighting against the odds: Hong Kong journalists in transition. *Gazette*, 50, 1–20.
- Chan, J., & Lee, C.C. (1991). *Mass media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The Hong Kong press in China's orbit*.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Chen, C., Zhu, J., & Wu, W. (1998). *The Chinese journalist*. In Weaver, D. (Ed.), *The global journalist: News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pp. 9–30). Cresskill, New Jersey: Hampton Press.
- Deng, L., & Ma, W. W. (2009). *Perceived journalistic roles of J-school student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Hong Kong and PRC*.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9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Boston, MA.
- Deuze, M. (2000). *Journalism education: Considering theory, goal and changes*. Working Papers of the Institute for Broadcasting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ologne, 79–94.
- Deuze, M. (2005). What is journalism?: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ideology of journalists reconsidered. *Journalism*, 6(4), 442–464.
- Fairbrother, G. (2003). *Toward critical patriotism: Student resistance to political education in Hong Kong and China*.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Fröhlich, R. & Holtz-Bacha, C. (2003).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A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London: Hampton Press.
- Gans, H. J. (1980). *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Newsweek and Time*. New York: Vintage.
- Greenberg, B. S., & Lau, T. Y. (1990). The revolution i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Gazette*, 45, 19–31.
- Lee, C. C., Chen, C. H., Chan, J. M., & Lee, P. S. N. (1996). Partisanship and professionalism: Hong Kong journalists in transition. *Gazette*, 57, 1–15.
- Lo, V. H., Chan, J. M., & Pan, Z. (2005). Ethical attitudes and perceived practic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journalists in China, Hong Kong and Taiwan.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5(2), 175–193.
- Mellado, C. (2015). Professional roles in news content. *Journalism Studies*, 16(4), 596–614.
- Robert, A. H., & Zhao, Y. Z. (1998). *Sustaining democracy: Jour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objectivit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Sanders, K., Hanna, M., Berganza, M. R., & Aranda, J. J. S. (2008). Becoming journalists: A comparison of the professional attitudes and values of British and

- Spanish journalism students.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3, 133–152.
- Schudson, M. (1978). *Discovering the news: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s*. New York: Basic Books.
- Schudson, M. (1995). *The power of new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chudson, M. (2003). *The sociology of news*. New York: W. W. Norton.
- So, C. Y. K., & Chan, J. M. (2007). Professionalism, politics and market force: Survey studies of Hong Kong journalists 1996–2006.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7(2), 148–158.
- Spyridou, P. L., & Veglis, A. (2008). The contribution of online news consumption to critical-reflective journalism professionals: Likelihood patterns among Greek journalism students. *Journalism*, 9(1), 52–75.
- Waisbord, S. (2013). *Reinventing professionalism: News and journalism in global perspective*. Malden, MA: Polity Press.
- Weaver, D. H., Bean, R., Brownlee, B., Voakes, P., & Wilhoit, G. C. (2006). *The American journalist in the 21st Century: U.S. news people at the dawn of a new millennium*.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 Weaver, D. H., & Wilhoit, G. C. (1986). *The American journalis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Weaver, D. H., & Wilhoit, G. C. (1996). *The American journalist in the 1990s: U.S. news people at the end of an era*. Mahwah,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Weaver, D. H., & Wu, W. (Eds.) (1998). *The global journalist: News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Cresskill, New Jersey: Hampton Press.
- Wu, W., Weaver, D. H., & Johnson, O. V. (1996). Professional roles of Russian and U.S. journalists: A comparative study.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3(3), 534–548.
- Xu, Y., Chu, L. L., & Guo, Z. S. (2002). Reform and challenge: An analysis of China's journalism education under social transition. *Gazette*, 64, 63–77.
- Zhu, J. H., Weaver, D. H., Lo, V. H., Chen, C. C., & Wu, W. (1997). Individual, organizational and societal constraints on media professional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journalists in the U.S., China and Taiwa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4(1), 84–96.

本文引用格式

鄧力 (2016)。〈新聞教育如何塑造不一樣的未來記者：中國大陸與香港新聞學生對記者角色認知的比較研究(2008–2014)〉。《傳播與社會學刊》，第36期，頁69–103。